

让领导作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

——读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有感

任弼时同志30年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革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40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开始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后，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为全党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实现空前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 叶介甫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由此拉开了长达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协助毛泽东牢牢把握整风运动的正确方向，为加强党的思想领导，还多次论述转变党的工作作风这一重大问题。1943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长篇演讲，他提出，“抗战以来，边区的环境变化了，任务也变化了，而我们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还没有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转变我们的领

导作风，却仍然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办法，这就需要我们今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他还从坚持民主集中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对转变党的工作作风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

坚持民主集中制

延安整风运动在组织领导方面的特点，是既实行集中指导下的广泛的民主，又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

任弼时在演讲中指出：“党的组织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

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至于在党内关系上，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自然，这个集中制又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接着，他详细列举了离开党的领导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然后指出，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与阶级立场的不坚定而产生出来的。假如我们“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不能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彻底地揭发它、批判它与纠正它，反而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它存在，让它发展下去，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无法建立，高干会上所决定的许多政策也就无法执行，无法贯彻到底”。

因此，他要求各个党的组织，党的干部，要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

克服官僚主义

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弼时还强调要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批评了那种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去改进工作方式的“老一套”工作方法，说这是各级领导者感到工作“棘手”和“办法少”的主要原因。

他提出：“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他还强调，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人。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做事的积极性，只要这件事情是群众需要的，是适合于边区建设利益的。

在演讲中，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然后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第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第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第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然后就这三点分别详加论述。其中，他谈到有了工作计划和配备了好的干部之后，特别要重视审查工作。如计划是否切合实际，干部配备之是否恰当，都要在经常的审查中来解决。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发出具体的补

充指示，及时地调换这种不恰当的干部，用称职的恰当的代替他们。他提出：“第一，我们审查一件工作，不能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它的具体结果。第二，我们在进行审查工作的时候，不应当是仅仅从上而下的，仅仅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审查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审查。”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应当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简单地了解工作中的情况，而在于从了解工作情况中想出改进工作的办法。

他还说，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而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的基本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用典释义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

【讲话原文】

中国有句古语叫“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

【出处】

正阳和气万类繁，君王道合天地尊。黎人耕植于义圃，君子翱翔于礼园。落其实者思

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咎繇为谋不仁远，士会为政群盗奔。克宽则昆虫内向，彰信则殊俗宅心。浮桥有月支抱马，上苑有乌孙学琴。赤玉则南海输赉，白环则西山献琛。无劳凿空于大夏，不得骧角于罽林。

——（南北朝）庾信《徵调曲六》

【解读】

庾信（513年—581年），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公元544年，梁元帝派他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西魏皇帝非常赏识庾信，他被强留于长安，永别江南，内心很是痛苦。他在长安一直住了将近30年，非常思念故土，于是作《徵调曲》六首。《徵调曲》六

首皆为整齐的七言诗，这是其中第六首。

徵为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相当于现在简谱中的“5（Sol）”。庾信此组作品以遵守仪式音乐要求为鹄的，在自觉采用新体的同时，以文法、赋法为歌，从体式与技巧两方面更新中国诗歌传统，折射出中国礼乐制度变革对于诗歌之影响，实为乐府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诗中的“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其意为：吃到树上结的果实，便想到了结果实的树；喝到河中的水，便想到了河水的来源，表达了诗人对故土的思念之情。下句即成语“饮水思源”的出处。

（杨立新）

干部国学院

陈寅恪写史观人

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赵璐璐



陈寅恪

孺和李德裕为代表，起初因政见不同引起纷争，而后发展为历经几期的党派之争，对唐后期政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牛李党争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陈寅恪在书中从社会阶层角度点出了牛李党争的实质是两晋以来的山东士族与科举产生的新兴阶层的斗争，识见卓然。值得关注的是，在探讨深层历史原因之外，陈寅恪还特别关注牛李党争中的个人命运。

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但与李党之王氏结婚，以图仕进。李商隐虽有诗才，仕途却并不顺利。如陈寅恪所言，身处两党夹缝之中，使得他一生在政治上都不得志。作者哀叹诗人的凄凉身世，有感于党争对个人产生的压迫，行文中间隐含着对李商隐怀才不遇的同情和遗憾。

然而其后话锋一转，论及另一出入两党之间的人物柳仲郾。柳仲郾虽是旧门，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受牛僧孺之知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谷者，诚相悬远矣。

陈寅恪讨论李、柳二人，均意在证明牛李党争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及其对时人的影响。但仔细分析，又不仅仅在于此。陈寅恪前论李商隐的身世遭遇，谈及社会风气的压迫，让人不由得生出感伤之情。想见当时社会情形，李商隐一生坎坷，很有点世事无常，个人努力、才华难敌命运的感觉，现出悲凉之意。而后话锋一转，论及柳仲郾，讲他在牛李党争中竟能置身恩怨之外，并为两党接纳，却是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味道。纵然是世事纷纭，命运无常，人们对许多事情可能无能为力，但作者希望表达的是，人生在世，一定有借以安身立命的支柱，只要自身保存住一些信念，坚守住一些东西，那么无情的命运和变幻的时代也不能最终将人打败或玩弄。

陈寅恪对李商隐的经历固然十分同情，可是他于李商隐之后立即写就柳仲郾一段经历，却显示出他对李、柳二人的判断。作者显然认为李商隐若非为求仕进徘徊两党之间，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而柳仲郾虽在出

身上属于牛党，却因其家风和个人品质为李党所认同，后来更是在李德裕失势后，仍旧提携李党成员，终获两党认可，官至高位。陈寅恪实际上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读来确有一种“回环往复之情味”。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最后所担任的两任官职，均是柳仲郾安排的，这可能也是柳仲郾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表达对李商隐的同情和理解吧。

陈寅恪专门写李、柳二人，固然想从个人命运方面表达党争所带来的社会风气之扭曲，更深层的则是寄托了对现实、对人生的理解。在陈寅恪所生活着的那一段岁月中，世事之无常，家国之动荡，恐怕更胜唐代中后期，个人命运之坎坷也更甚。陈寅恪在战乱中书稿丢失，后又因眼疾至几乎失明，但仍笔耕不辍，其著作文章开创了魏晋隋唐史研究的崭新范式，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从他的学术研究取向来看，陈寅恪放弃研究“塞表殊族之史事”而回到域内之史，除了受到材料的限制之外，也是不甘落于国际汉学之后。陈寅恪不再使用西方汉学家所沿袭的以语言学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而是回到中国历史本身来开创新的研究道路，是因为他明白，只有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对外来治学方法尽力吸收，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治史方法，才能真正超越西方汉学家。可以说，陈寅恪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正因为他能够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最终才能够达到近代中国史学的高峰。

同样，陈寅恪对于民族国家，怀有同样的期待。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中国一切传统文化的那个时代，陈寅恪希望整个中华民族保留一些固有的东西，找到真正的文化之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中保有自己的立席之地。所以，对于全盘西化他一直持反对态度，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这种种对人生对学术对文化的态度，其实都在感叹柳仲郾经历时一句“虽外来之世变纵横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表达了出来，对人生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所坚守，才能从容应对世变之纷纭动荡。

值得回味的是，陈寅恪虽然对李商隐的做法并不赞赏，可他依旧对在那样的社会风气中做如此人生选择的诗人报以同情之理解，并没有去批评和苛责。陈寅恪并没有非议李商隐，因为知道他已经经历了很多坎坷，他不忍心责备李商隐。不过通过对柳仲郾的称赞，读者或许能够感受到，在陈寅恪的理想中，他希望时人和整个中华民族，都能够像柳仲郾一般，在人格、民族上保持独立，这是一种士大夫气节的表现，也是陈寅恪毕生追求的精神境界。

所以，陈寅恪引用李、柳二人的材料，绝非是排比史料，或者仅仅去描述党争对当时个人之影响，而是寄托着深沉的感情和深远的用意。他对史料的使用和排序，都有仔细的思考，读者在阅读当中，其实已经走入其所理解的历史之中，往深层去思索，更是可以体会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出于他所研究的中古史和他所经历的近代史之间，获得的除了对历史的识见，还有对人生的思考。

□ 褚振江

宋人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少年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老前辈答曰：“勤谨和缓。”胡适先生当年讲“治学方法”时，也引用了这个对话。细细思忖，此言极是。

勤，指做事尽力，不偷懒取巧，老实、扎实、踏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勤，能让人聪明起来。勤，就要始终保持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勤，就是青灯黄卷、秉烛探幽；就是椎心泣血、精勤不倦；就是不负流年、甘守清寂；就是书破万卷、路行千里。读书真事业，磨墨静功夫。学问高峰的突起，源于知识的培植和积淀。把功夫下在平常、恒常上，板凳坐得十年冷，入乎其内，不舍昼夜，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谨，是谨言慎行的学术态度。有谨慎、小心、庄重、恭敬之意。谨是治学的品格，态度必须认真负责，思维方法务求科学缜密，要像鸿鹄深下水，莫学蜻蜓点水漂。孔子说“执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地去做，不粗心，不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谨，就

是细细琢磨，考镜源流。清初，一代大师顾炎武，当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时，常载书箱三车，随时周游四方，随时寻获与向说不符之实质证据，或从父老口中获得矛盾相反的故事（他的论据材料多自父老口中收集），就立即在书上加以校正。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重、神圣，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实之又实、严之又严，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

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鉴古开今，气宇宽广。胡适先生称：“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也动不得。”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做学问要胸怀大千，爱智求真，以求名利来保养恬淡之心，以柔退谦让来调和学界关系。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虚地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托尔斯泰也有言：“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越小。”

何谓缓？简言之，就是有

理、有据、有责任心。如康德所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讲逻辑、有底线，是为有理；“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注意信息源，不妄加揣测，是为有据；自由与责任一体两面，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是为有责任心。缓，就是叫你澄心静观，莫急躁迫切，不轻易定结论。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比照勘正多方资料。“读书切忌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宋代大儒陆九渊的这句名言，后面接着的两句同样重要，“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不明白、说不清、有疑问的可以先放一放，仔细思量后再发表意见也不迟。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搜集证据，反复验证，花了二十年工夫，还认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完善的地步，而迟疑不决未公开。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小的变异积聚起来的，但没有急于正式发表。这就是缓。

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读书治学善于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志于斯且乐于斯，必定有大收成。

治学方法